

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

辛德勇

《文史知识》2009年第3期上所刊田同旭撰《罗贯中到底是哪里人？》一文，就《三国演义》作者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提出新的解说，以为前人所主张的山西太原说与山东“东原”说这两种看似互不相容的观点，从其原始记载来看，本来只是指今山西太原，与今山东之“东原”并没有什么关系，故“东原罗贯中”亦即“太原罗贯中”，罗贯中为山西太原人“应当是个明确的结论”，而所谓山东“东原”说，不过是后人误读误解相关史料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谬说而已。

而今各地方关注名人故里，大多意在为乡梓增添历史的光彩，进而复将其用作文化资源，加以开发利用。田同旭氏供职于山西大学而力主罗贯中身属太原，故所作论述，与此世风不知是不是也有一定关联。惟著名历史人物的生长地点，实际上关系到诸多历史现象所赖以产生的自然、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环境，在学术上自有不可忽视的价值，确实需要尽可能辨明真相。

学术研究贵在创新，写论文一定要勇于提出独到的见解。不过，《文史知识》是一份普及性刊物，它的读者大多并不是专业研究人员，在这里讲述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时，还是应当尽量慎重一些，尤其需要注意运用史料的准确性。我没有好好读过《三国演义》，更没有接触过前人有关罗贯中籍贯的讨论，本来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。不过，由于田氏此文主要是就太原的地名展开论述，与我所学专业有关，所以，在这里想就相关地理文献的解读，谈一点儿不同看法，供大家参考。

按照田同旭的叙述，所谓山东“东原”说，最早见于嘉靖刊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卷首之蒋大器序，乃称述罗氏曰“东原罗贯中”。因《尚书·禹贡》有句云“大野既潏，东原底平”，东汉郑玄注以为“东原，地名，今东平郡即东原”（见《史记·夏本纪·集解》），后世论者便疏释蒋序所说“东原”为今山东东平。过去持此“东原”说者，以为其它文献所记“太原”当属“东原”草书字形的讹误；而持太原说者，则又反过来推测蒋大器序文当中的“东原”应是“太原”的误书。

关于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，文献记载确实比较复杂。明朝弘治至嘉靖年间人郎瑛在《七修类稿》中还记述说罗贯中是杭州人，嘉靖万历年间人王圻稍后著《续文献通考》，也有相同的记载。前人疏通“东原”与“太原”文字差异的做法，启示我们这种南人与北人的差异，同样也未必非互相排斥不可，或许可以思考是不是存在北人南寓的可能。惟折中调和文献记载的歧异，需要有合理可信的依据，类似这样的猜想，仅仅是一种研究的思路而已。

若单纯就“东原”与“太原”两种说法之间的关系而论，从草书“东”、“太”二字的形体和古代典籍文字讹误的一般规律来看，上述两种说法，都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推测。由于作为通行的地名来说，“太原”要远比“东原”更为世人所知悉，“东原”讹作“太原”的机率，相对来说似乎要更大一些；再说“东原罗贯中”这样的题署形式，除了嘉靖以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诸本之外，尚别见于明金陵世德堂刻本《三遂平妖传》，诸书一同致误的可能性自然会更小一些。

然而，田同旭却另辟蹊径，依据《水经·汾水注》如下记述，对“太原”与“东原”之

间的矛盾，做出了全新的解析：

汾水，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。……东南过晋阳县东，晋水从县东南流注之。太原郡治晋阳城，秦庄襄王三年立。《尚书》所谓既修太原者也。《春秋说·题辞》曰：高平曰太原。原，端也，平而有度（底）。《广雅》曰：大卤，太原也。《释名》曰：地不生生物曰卤。卤，垆也。《穀梁传》曰：中国曰太原，夷狄曰太卤。《尚书大传》曰：东原底平，大而高平者，谓之太原，郡取称焉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城东有汾水南流，水东有晋使持节都督并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成王之碑。

上述引文和标点，俱照录田文，其中颇有一些地方，似乎不够妥当。譬如与这里所论述问题直接相关之《尚书大传》引文，应当截止于“大而高平者，谓之太原”一语之下，在此圈以句号，清人袁钧纂集《尚书大传注》、王闾运补注《尚书大传》，从《水经注》中辑录此语，都是截止于这里，而其下文“郡有称焉”云云，应该是《水经注》作者酈道元自己的话，乃是遥承上文“太原郡治晋阳城”一语，总括《尚书》、《春秋说题辞》、《广雅》、《释名》、《穀梁传》和《尚书大传》诸书相关记述，为太原郡的得名缘由作出疏释。田同旭认为，上引《尚书大传》以及《水经注》的记载，足以“说明汉代即有学者认为东原不仅指今山东之东平，也指山西之太原”；田氏复进而质问说，那些主张罗贯中籍隶东平的学者，“不知为何对《尚书大传》与《水经注》所记‘东原即太原’视而不见，致使太原说与东平说二家长期争论不休，人为制造了一场学术疑案”。

今案原、隰对称，经传屡见，《诗·公刘》“度其隰原”就是众所熟知的例证。《公羊传》昭公元年注释“大原”（太原）地名当中的“原”字，谓“上平曰原，下平曰隰”，即是并言原、隰。检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尚书大传》，亦有语云“下而平者谓之隰”。依《公羊传》例连类比附，可以推知，《水经注》引述的《尚书大传》似乎有所阙略，其原文在阐释《禹贡》“东原底平”一语当中的“原”字时，理应先写有“高而平者谓之原”的说法；事实上，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，才会谈到“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”云云这样的话，以进一步阐释这种“原”之“大而高平者”尚且另有专名，“谓之太原”。《水经注》引《春秋说题辞》谓“高平曰太原”，虽然不如《尚书大传》“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”的说法准确，但二者语义却大致相同，都是解释“太原”作为普通语词的涵义，与某一特定地名并没有直接关联，更根本没有“东原”其地即是今山西之“太原”的含义，而如前文所述，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引述此说，亦不过是用以说明太原郡的得名系缘于其地“大而高平”而已，与所谓“东原”本绝然无涉。田同旭的解析，与其原意相去甚远，而且检核相关地理文献，可知以“东原”来指称“太原”，绝没有任何其他例证，因此恐怕不能成立，从而也就无助于解决罗贯中的籍贯问题。

除了上引《水经注》的记述之外，田同旭还引述有明陈耀文纂《天中记》、清孙之騷辑本《尚书大传》，以及清赵一清著《水经注释》的相关内容，宣称“明清两代学者也普遍认为东原即太原之说”。然而，核诸田氏引文，可知陈耀文《天中记》实际上是依样移录《水经注》的文字，这本是此等类书通行的作法；而孙之騷辑《尚书大传》则只是编录佚文，并没有表述自己的看法，况且其相关佚文就是从前引《水经注》文中录出；至于田氏所引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，更只是酈道元《水经注》的原文，没有摘录出一句赵一清氏本人撰著的释文，实际上等同于重复引证前述《水经·汾水注》的内容。可见，在这些明清人的著述当中，同样也根本不存在“东原即太原”的说法，田同旭此说，事实上竟没有一条足以凭信的史料依据；若非另行找寻到其它佐证，似此无根之谈，姑且置之可也。

2009年3月6日记
原刊《文史知识》2009年第5期